

一、中苏文化领域合作

1. 中苏文化交流座谈会记录（1952 年 12 月 3 日）

中苏文化交流座谈会

时间：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日下午二时至五时

地点：北京饭店 213 号

出席：吉洪诺夫、吴玉章、李四光、周扬、钱俊瑞、陈忠经、洪深、竺可桢、
胡愈之

记录：静秋、查怀霖

钱俊瑞同志（以下简称钱）：在吉洪诺夫同志离开北京的一段时间内，中苏友好协会总会邀请了文化、教育有关方面对中苏文化交流的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今天把这意见谈一下，请考虑。

第一，在过去两年中苏联教授先后来中国讲学，得到很大的收获，我们建议一九五三年邀请一位近代史、一位中古史的教授来讲学，这次叶菲莫夫到这里来讲演，受到很大的欢迎，但因时间短，还未能展开深刻的讨论，是否可以考虑请叶菲莫夫或别的近代史学家到中国来作几个月的讲学。另外去年曾经请过一位中古史的学者，大家都很喜欢，所以我们还希望有一位来讲中古史。

吉洪诺夫（以下简称吉）：中古史是东方的还是世界的？

钱：欧洲的。（后改为东方的。——记录）

第二，音乐界要求明年请几位乐队指挥、合唱队指挥、声乐家等来讲学指导。

吉：合唱队指挥是个人来还是带乐队来？

钱（及周扬同志）：个人来。

第三，我们可以派遣古典歌舞剧团，如京剧、地方剧等去苏联，我驻苏使馆已提出此项要求，文化部也同意，与歌舞剧团同去的还可以有几位专门搞戏剧工作的同志，一面介绍中国戏剧工作的情况，一面参观并学习苏联的戏剧工作。

吉：是整个一班去，还是个别的去？

周扬（以下简称周）：整个一班去，因为这样可以作演出。

吉：是否像绍兴戏那样？（他们对绍兴戏最感兴趣——钱俊瑞同志谈），

是否可以由京戏先去，然后绍兴戏再去，一批批地去，这些演员对苏联戏剧发生兴趣，也可以看一下。古典歌舞剧团是一次去一个还是一次去几个？

钱：看吉洪诺夫同志的意见怎样？

吉：京剧班子去作一个京剧演出，绍兴剧班子去作一个绍兴剧演出比较好，若是合起来就有些像晚会的性质了，是否上半年京剧去，下半年绍兴剧去，中国京剧是否有很长的时间没有到莫斯科去了？

周：很久了，还是梅兰芳去的一次。

吉：哦，是的，还有马戏团也是那次去过后就没有去了。这一条很好，很满意。

钱：第四，中苏友协派三、四十个干部去学习对外文化协会的工作方法及工作经验，时间约为三个月。这一条已经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接过头了，但后来因这边工作的关系没有派去。

第五，希望准备一些规模大的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的图片展览会，这一条本来准备在这次“中苏友好月”举办的，但我们接头时已是九月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答复说：这样大规模的展览需要准备一年，所以只得今年谈一下，请预先准备，看看是否在明年十月革命节的时候可以展览。

第六，我们组织了一些美术展览，包括现代国画（约百幅）、敦煌壁画临摹本（约七、八十幅）、漫画招贴画等去苏联展览。

吉：时间是否可以确定？

钱：都可以在明年九月中。

第七，关于文化资料交换问题：影片除了电影局订了合同的一部以外，另总会在半年前提出：希望能有一些关于集体农庄、工厂生产和工人生活以及科学常识方面的片子，特别需要。苏联需要我们供给哪一方面的片子？

吉：我不了解互相送影片的情况，我所知道的中国片子都去了。

周：电影发行公司看到哪一片子可以送出去，就送到苏联去了，那是经过输出公司选择其中一部送去的，不是全部。

吉：这问题是否可以提供给电影代表团，他们可以考虑，但在这里也可以作为资料交流保留下来。

钱：还有唱片、幻灯等。

胡愈之：苏联的幻灯是给国际图书馆出的，现在上海有一些公营公司

复制。

洪深：我们作的幻灯少，明年要作，因为幻灯可以在各地放映，它比电影普遍，我们希望能和苏联多交换一些幻灯片。

钱：将来设法与他们多交换关于科学、教育方面的幻灯片子，图片还希望继续交换，关于出版物的交换，过去是国际图书馆作，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最近想拟定一个出版的方法，这一方面有什么意见请给我们提出。

吉：我不了解交换出版物的情况怎样，也不了解交换是哪几方面，是否可以和叶菲莫夫、格鲁森科谈一下。

钱：第八，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谈要在苏联建立中国馆，他们曾来电报希望我们供给中国的资料、图片、标本等东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也要作这工作。

吉：中国馆是长期的还是有一定时间开放？

钱：从电报上看好像是经常的，详细的情况不知道。这一点请回去了解一下，假使这一工作需要我们帮助的，请告诉我们以便准备。

第九，给我们推荐一些优秀的作品，无论关于文艺、科学、教育的，他们认为好的、需要的，我们就可翻译。

吉：将来通过对外文化协会可以把这些书单提出过来。

胡愈之：希望再介绍一些特别是关于科学界的、建设方面的、合作社财政经济、工会制度，劳动保险技术等方面的东西，这些我们过去翻译很少，不像文学艺术等方面还零零碎碎的有一些，所以希望多推荐一些。

钱：请将得到斯大林奖金的科学著作及时地介绍给我们。我们提出以上初步意见请考虑。

吉：有一些不能具体确定，如学者讲学不能确定谁来，但愿意每一个问题都谈一下。

胡愈之：关于请历史学家的问题，我所了解的过去的古代史学家及叶菲莫夫都是讲东方的历史，我们希望能够来一位东方的历史学者。

吉：关于音乐方面，我想查哈罗夫在谈，关于历史学、生物学的问题也在座谈中会牵涉到。

钱：他们谈的恐怕是着重谈到一些专门的问题，不会谈到这一些的。

吉：关于乐队指挥、合唱队指挥需要明确一下，合唱队是群众性的合唱队还是演出性（演员性）的合唱队？

周：演员性的。

吉：指挥就作为教授来中国，另外一个声学家呢？

钱、周：声学家要能实际唱的。

吉：歌舞剧团到苏联跟几个戏剧家去最好。

钱：是的，另外三、四十位同志去苏联学习还没有组织起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还没有回答。

吉：九月中古画，敦煌画、漫画可能到苏联去是吗？

钱：这三种画如果有地方可以分开举行展览，有几个画家可以跟去学习。

吉：第七条关于电影片的交流，总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什么？

钱：另一方面主要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

吉：唱片、幻灯、图片都照旧送来，影片希望多要一些记录，科学、艺术、农业、新闻、工厂生活方面的。

唱片方面以后再具体谈。苏联的艺术工作者是否都作了录音？是否将来出一部电影片，将来会到莫斯科？

钱：将来是要将这影片送到莫斯科的，片名暂时叫“伟大的友谊”。

吉：关于幻灯片是否可以提出具体的意见？

钱：希望要科学教育方面的片子。

吉：一般出版物资料交流也要确定一下，先需要什么？以后需要什么？过去我们在这一方面是有计划的，最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给你们了什么？

钱：最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把科学院，外交出版社出的除教科书外，作为一个重要的出版物都交给友好协会了，每两个月一批，每次有两三箱。

吉：这一方面工作很顺利。

钱：问题是我们利用得不够，运来以后，懂得俄文的不多，不能及时地拿来用，我们想，再有一、二年情况就会大变了。

吉：分会是否都利用了？

钱：据上海报告说，懂俄文的人不多，看得不多，画报看的人多。

胡愈之：过去各地方要书都送到总会，但是都没有发下去，以后别的地方要书最好通过总会，再由总会发下去。

钱：将来要合理使用才好，实际问题是懂得俄文的很少，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几个月来，科学界开始了突击速成俄文，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学到一千五百个生字，基本文法都懂得了，关于本行的教科书都看得懂了，现在国际书店与二、三月前不同了，以前去买书的人很

少，现在学习的人多了，买书的也多了。

吉：我听到你们谈学习俄文的情况想起一点，代表团一入中国国境，就感到不会中国话是很苦的，现在就缺少一种课本，就是学习汉文的课本，这课本不要作为研究的东西，而是一般的浅近的东西，这课本是教大家学习俄文^①并希望在课本前有一些会话，有俄文、有汉文，能够拼音的。

钱：天津出了一本中俄会话。

吉：我还没有看到。

吉：……（缺记录）他去时和萧三谈过，中苏友好协会准备向苏联介绍诗集，这些材料是否有了？

钱：现在还没有作。

吉：原文的有没有？

周：……（缺记录）拿去一本中国诗，不知道翻译过去没有。

吉：萧三讲过收集好了一些诗准备翻成俄文，包括很早的旧诗直到近代的诗，中苏友好协会准备作这个工作，那很好。苏联有些人也准备翻译这些诗，他们希望和中国懂诗的人见见面，谈谈中国诗的特点，音韵，以便避免硬翻，（譬如把本来应是很短的句子翻得很长，或翻得很不恰当。）是否萧三同志这次路过苏联给讲一下或是请别人给讲一讲。

周：可以，我们想办法。

吉：应明确一下要讲几次。

关于中国诗的翻译在苏联愈来愈多，我们感到存在着一些缺点，但这也难怪翻译。

希望今后能收到报道中国生活方面的一些文章：中国的建设、艺术、戏剧等方面的活动、批评的文章，（也包括对苏联方面的，如文艺批评，对鲁迅或对高尔基），希望将这些东西不是以报道性的而是以写文章的形式写出，这样就可以在文学杂志上刊载。关于政治生活方面的东西我们也需要，朝鲜前线的报道也需要，如巍巍写的文章，可以通过中苏友好协会送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那里他们会组织人来翻译。

对于中国馆我了解得不大清楚，估计会是经常性的，而且还不只是展览中国的东西，还可能有讨论会、幻灯片等，这个馆很重要，可以叫中国文化宫。

我还不清楚刚才谈到过的说苏联有电报来过要材料的事？是否具体提出

^① 档案原文如此，按前后句意似应为“汉文”。

要什么？

钱：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拍来的，要中国文化各方面的资料，如建设方面的图片、民族服装等。

吉：一般所要的到现在为止只是印刷性的还是有实物？

钱：有实物。

吉：关于第八条，协助苏联建立“中国馆”的问题，中苏友好协会是否过去就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连系过，还是现在提出的？

钱：过去就有连系。

吉：中苏友好协会对于建立中国馆，是一般的了解还是很清楚的了解？

钱：一般的了解，现在只知道建筑的情况，还需要继续了解。

吉：关于作家之间相互交流经验的问题是否可以派一些苏联作家到中国来（个别的）。

根据我这次的经验，我是个作家，又是在完成“中苏友好月”任务中的代表，这样就不能完成作为一个作家所要完成的任务，我希望今后有这样的作家到中国来：他们参加到中国的生活中去，和工人在一起生活；到农民家去拜访，在农民中生活；到实际生活中去。譬如，要看一看杨^①子江等，这样就使得一个作家不是参加很多的活动。作为一个科学家也是一样，格鲁森科和我在一起去的路上，常谈起这个问题：沿路上看到了些东西，但总感觉是匆匆忙忙的，而这对“中苏友好月”来说是必要的，能够和更多的群众接触，对深入研究来说，没有作到。作为一个音乐家也是这样。叶菲莫夫看到中国的史学家就像八角鱼把他粘住了一样，但又得赶紧拔出来，因为时间太少了。

中国的同志到莫斯科去也是这样：不只是要看一看，而是要在自己业务方面多深入研究。

艺术工作者到中国来觉得中国很大，时间短不能都去到，特别是西北、西南、昆明、迪化等地去得少。哈依到迪化去了，据她讲她在战争期间曾从中央亚细亚乌兹别克斯坦到过迪化。这样看来就可以商量从中央亚细亚直到西南、西北去是很方便的。

钱：我们计划有一批科学家到苏联科学院去学习，有些大学教授去专门学习高等教育方面的东西，画家、歌舞团、戏剧家也可以去。

① 原文如此，应为“扬”。

吉：如果苏联作家到中国来，最好是能与他相同的作家在一起生活，两人可以一起出去旅行。

苏联关于文学、艺术，特别是戏剧方面创造典型问题的讨论，是否可以与中国建立联系，派人参加也好，书面材料连系也可以。

钱：事先如果能够通知我们，譬如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内容是很丰富的。假如有几个人参加的话，那所得到的好处就大了。

吉：我想提一下，这个问题可能与中苏友好协会关系不大，就是关于中国的体育运动：在中国看到了许多种运动，但是中国缺少一种运动，就是爬山，而爬山对于真正的体格的发展、知识、智慧国防的发达，都有很大利益的。

中国有很多山脉，有最高的米^①穆朗玛峰，应该展开这方面的运动。苏联在这方面的运动发达，可以与苏联体育委员会建立起连系，慢慢地也就会搞起来了。

关于第九条，这些书是翻好寄来还是推荐？

钱：推荐。

吉：你们所要的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作品只是文学方面的还是包括其它各方面的。

钱：所有各方面的。

吉：儿童方面的文学交流情况怎样？是否可以互相介绍一下？

钱：非常需要。

吉：希望能相互介绍一下，中国是否有好的儿童作品可以给我们？

胡愈之：有儿童读本，儿童作品很少。

吉：虽然少，但可以推荐一些，我们现在抓到就翻，需要缓翻的先翻了，而需要先翻的没有翻，如果能够推荐，就避免了这种现象。

胡愈之：可以开个单子让楚拉基同志带回去。

吉：这个单子不会很大，是否可以连书一起寄去，直接寄给苏联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

胡愈之：可以。

吉：格鲁森科、查哈罗夫、别洛沙普柯、叶菲莫夫，他们的座谈是否也是中苏友好协会组织的，是谈中苏友好协会和他们建立关系的问题，还是谈

① 原文如此，应为“珠”。

专门的问题？

胡愈之：谈专门的。

吉：是否有些问题需要解决，座谈后问题集拢起来到这里？

钱：当然会的。

吉：希望能够把这些问题收集起来。

答：今天晚上就全部收集起来。

吉：这个计划很好，很多东西都包括在内了，关于计划就谈到这里。

对于文化工作者代表团是否有意见？我们的计划是否完全实现了？大家是否满意？可以提一下。

钱：计划是都完成了，在各城市的讲演、座谈会，都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所有城市都感到时间太少了。很多问题想请教他们，时间不够。另外一方面，中国同志的准备不够，如座谈会、访问，事先对问题没有很好的准备，这是一个缺点。

吉：这次“中苏友好月”的活动之所以获得成绩，是由于最初的计划考虑得较成熟，时间短，但在计划中西南、西北也照顾到了，兰州、重庆都去了，周密地研究了计划，计划内也考虑到气候与交通工具的条件，这也是促成完成工作的条件，有些地方气候不太好，但还顺利地完成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友好月吗？

钱：是的。

吉：苏联有这样一句俗语，“第一张饼不是烙得很平整的”，但是我们烙的第一张饼不是不平整，只是斜了点，但还是平的，就像我们吃的奶酪一样（吉洪诺夫同志所指的是一种吃的契斯）上面还有一些洞（他的意思是说工作还有些小的缺点）。

这次到各地走了一下，有很深印象和很大的感触，而这种感触特别深刻，一省省地很快过去了，随着气候、景致、人物各方面的变化，更加深了我们的感触。到处感到中苏友好协会分会在不停手地工作着，而且不管到哪里总是听到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关怀，特别感谢总会的是当我们在长沙时，知道要到湘潭韶山毛主席的故乡去，感觉非常的愉快，令人欢欣鼓舞。

在毛主席的家乡中，毛主席父母的坟需要整理一下，有人和我讲，毛主席父母的坟怕国民党来了破坏，因此给平了，到现在只是一个草堆。假使不知道的人，几乎看不出是个坟墓，应该修理一下，以便留一个纪念物。

钱：请将到各地去后对我们的文化、科学、教育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

吉：关于科学方面，到各地接触很少，很难提出具体意见。关于文学方面，中国现在已相当发展，中国作家在不断写出作品，这些作家都是亲自参加斗争的，这些作品都是以战斗性的方式写出的。

中国的戏剧、古典剧有它优良的民族传统，绍兴戏是个新的方向，我们特别喜欢，这个戏有它的道路与前途，会发展起来的。

关于中国的杂技，最初感到它只与军队有连系，招待我们的都是军委的，但这很可以解释，过去的一些卖艺人，野战军的部队把他们请去了，长征时也有些杂技人参加，中国的杂技是世界上第一流的。

看中国戏时，感到人们都是兴高采烈地，每个戏都使人感情很激动，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时，我的翻译哭得不能翻了，客人也在哭，这是中国的朱丽叶与罗密欧。

中国的儿童也很健康，精神饱满愉快，查哈罗夫讲，在重庆的街上坐满了欢迎他们的小孩，使他很感动。

在上海参观了棉纺工厂，看到了纺织女工；讲到革命斗争、革命运动的情况，他们是中国真正的工人，年青、坚定。因此也使我联想到普基洛夫工厂的传统在这一点上是很一致的。

中国同志的战斗化的精神特别是苏联同志所熟悉的。

譬如我们在重庆走前发现火车内没暖气，中国工人一夜就把它装好了。我不记得是在重庆还是成都，欢迎我们的人有廿万。

钱：在武汉和广东看了地方戏有什么感觉？

吉：表演的技术很高，我所看到的都好，但有特别好的。

钱：原来计划回北京后请您看苏联剧本“曙光在照耀着莫斯科”，因为时间关系，不能看了。

吉：今后还会来中国的。晚饭是八点，现在是不是就谈到这里。

钱：可以休息了。

中国中央档案馆，G095-004-0023-0010，第 57～65 页

2. 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吴玉章——《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四周年》（1954年2月）

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四周年

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 吴玉章

伟大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到今天已经四周年了。值此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进入第二年，朝鲜停战已经实现，保卫和平运动已有巨大发展之际，我们来庆祝这个节日，是有重大意义的。

四年来，中苏两国忠实地履行着同盟互助的义务。中苏两国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有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苏联给予了我国以兄弟般的慷慨无私的援助。中国人民在伟大苏联的援助下，以英勇的劳动进行恢复工作的结果，到一九五二年，已使我国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工业生产比重显著上升，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在全部国民经济中有保证地得到逐步扩大。在苏联的援助下，我国已从一九五三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并已胜利完成了第一个年度的计划，进行了一百三十项重要基本建设，其中包括去年底开工生产的鞍山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七号炼铁炉，这三项工程被人们恰当地称誉为“中苏友谊的结晶”。在文化交流和其他方面，中苏两国的关系也有了广泛的发展。达到了今日全世界文化最高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人民建设自己新文化的榜样。显然，我国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迅速完成恢复阶段，我国整个建设事业之所以能够顺利发展，都是与苏联的援助分不开的。

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循着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

为了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苏联的援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的国际主义关怀，在马林科夫同志等苏联党政领袖去年秋季写给我国工农业展览会的题词中充分地表达出来了。题词中说：“在人民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中，会永远得到苏联各族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友好和积极支援的保证。”正是这样，在我国经济建设开始之时，苏联热诚地给予了我国多方面的援助。根据去年夏天我国政府代表团和苏联政府商谈的结果，连同过去三年来帮助我国设计的企业在

内，至一九五九年末，苏联政府将帮助我国新建与改建的一百四十一项规模巨大的工程，给以系统的经济的和技术的援助，这就将使我国人民能够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最新技术成就的努力之下，逐步地建立起自己强大的重工业，使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中国人民衷心感谢苏联伟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无私的援助。正如毛泽东同志致马林科夫同志祝贺十月革命三十六周年的贺电中所说：“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苏联的慷慨援助下，沿着苏联所胜利地走过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光荣道路上前进的时候，我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觉到中苏两国之间的亲密无间和两国友好的无上珍贵。”

为了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学习苏联是尤其重要的。关于学习苏联，毛泽东同志曾经作了重要的指示。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讲话中说：“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苏联是中国人民的良师益友，苏联所走过的道路也就是我国现在和将来所要走的道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已经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的正确性，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卓越的榜样。中国共产党正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学习苏联经验，依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线、方法和步骤的。因此，学习苏联就显得更加具有迫切的实践意义。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之下，中国人民正在进一步地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苏联执行新经济政策，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苏联人民在国家工业化时期艰苦奋斗的精神。全国各地的建设部门正在进一步努力贯彻苏联专家的建议，四年来的许多事实都表明了：凡是认真学习苏联并切实运用苏联经验的地方，工作就能顺利进展，避免许多错误。今后，苏联经验在我国建设工作中将更加显示出巨大的推动力量。

为了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中国人民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人民

深知：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胜利发展乃是自己建设事业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中国建设事业的成就又是增加和平民主阵营力量的强大因素。中国人民从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历史和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学到了宝贵的经验：帝国主义侵略者是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的，他们总是执迷不悟地企图挑拨新战争。因此，热爱和平并正在建设自己的幸福生活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苏联人民一样，一贯地以保卫世界和平为自己的责任。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就鲜明地贯穿着为持久和平与国际安全而奋斗的崇高精神，并且着重规定了“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的重要条款。四年来，中苏两国信守条约的规定，团结一致，忠诚合作，彼此协商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为保卫世界和平与安全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中苏友好同盟已经是并将继续是反对新侵略的可靠保证，是远东及全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目前的国际形势表明：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在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了争取和平和制止新战争而作的努力中，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朝鲜停战已经胜利实现。美国帝国主义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诡计正遭到重重困难，帝国主义侵略阵营的战争阴谋受到日益严重的打击。现在，中国人民必定继续加强与苏联的兄弟同盟，使之巩固得像钢铁长城一样，成为世界和平的前卫，并继续加强和整个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团结，努力发展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和经济文化关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冷战”和挑衅政策，为争取迅速召开政治会议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为争取召开五大国会议并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斗争。

在欢欣鼓舞地庆祝中苏友好同盟四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兴奋地看到：苏联人民正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满怀信心地沿着共产主义建设的道路前进。在苏联人民创造性的劳动之下，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正在胜利地实现。去年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和苏联共产党中央九月全会所通过的著名决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关于农业、日用品生产和扩大苏联贸易的各项决议，将进一步加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增进苏联人民的福利。苏联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所获得的辉煌成就和伟大力量，引起了中国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的欢呼。苏联始终不渝地执行着和平外交政策，正如马林科夫同志所说：“苏联政府，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竭尽一切力量，

以使各国人民和平相处，促使国际紧张局势缓和，并建立正常的国际关系。”苏联本着这种方针在保卫和平事业中所作的努力，引起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深刻响应。全世界一切民族的善良公正的人们都拥护苏联，团结到苏联的周围，并把希望寄托给苏联，这乃是当代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包括着七万万以上的人口和相连的占世界四分之一土地的中苏两国的兄弟同盟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尽管帝国主义者费尽心机来挑拨诽谤、阴谋破坏我们中苏两国的友好团结，他们丧尽天良的恶行已经遭受了并将彻底遭受到可耻的失败。中苏友好同盟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日益巩固与发展着，它是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的重要保证，它对于中苏两大国的繁荣和对于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都将继续发生巨大的作用。

伟大的牢不可破的中苏友好同盟万岁！

中国中央档案馆，Z123-6-409-4，第1～3页，发表于《人民日报》
1954年2月14日

3.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 1956 年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合作活动的决议^①（1956 年 9 月 13 日）

СТ № 22/196 гс^②

机密

用于表决

根据《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合作协定》，通过苏联文化部提案：

一、关于邀请中方来苏事宜：

1. 邀请中国出版社代表团一行 15～20 人于今年 9 月来苏学习关于书籍出版和发行方面的工作经验，为期 2 个月；

2. 邀请中国艺术工作者代表团一行 4～5 人于今年 9 月来苏了解艺术领域行政管理经验，为期 1 个月；

^① 决议用苏共中央书记处公文用纸书写。由 А. И. 列加索夫、В. Г. 格里高利杨、Д. А. 波利卡尔波夫、И. Т. 维诺格拉多夫起草并报送。

^② 会议纪要编号和呈送苏共中央书记处成员投票的决议项。参见：1956 年 9 月 14 日苏共中央书记处 22 号会议纪要（22 号，196 项）。决议投票通过；投赞成票：М. 苏斯洛夫、А. 阿里斯托夫、Н. 别利亚耶夫、П. 波斯佩洛夫、Л. 勃列日涅夫、Е. 福尔采夫。

3. 邀请中国电影工作者代表团一行 5 人于今年 9 月来苏学习宽银幕电影技术，为期 6 个月；

4. 邀请中国博物馆专家团一行 3 ~ 4 人于今年第四季度抵达苏联，协助苏联有关单位对苏联各博物馆中国部的陈列品进行完善，为期一个半月。

二、关于派遣赴华事宜：

1. 于今年第三季度派遣 1 名苏联印刷企业行政管理专家赴华，为期 6 个月；

2. 于今年 10 月派遣 1 名苏联胶版印刷专家赴华提供技术援助，为期 6 个月。

3. 允许苏联文化部与人民民主国家就 1957 年上半年召开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电影艺术代表会议举行会谈，以讨论电影领域创作和技术合作问题。

1956 年 9 月 13 日

附注：“抄送：葛罗米柯、米哈伊洛夫、科罗博夫、波利卡尔波夫、波诺马廖夫同志；第二项 1、2 条抄送潘友新同志。1956 年 9 月 13 日分送。”“签名，385/3 九月。”^①

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全宗 4，目录 15，案卷号 35，第 97 ~ 98 页，正本，机打文本

4. 苏联文化部部长 H. A. 米哈伊洛夫关于苏联代表团赴华讨论并签署《1957 年苏中文化合作计划》成果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57 年 1 月 30 日）

第 231c 号

秘密

苏共中央主席团：

—

本人现汇报关于苏联代表团赴华讨论并签署《1957 年苏中文化合作计划》的成果。

① 下方是起草和呈送文件人的亲笔签名。

苏联文化部长 H.A. 米哈伊洛夫率领苏联代表团于今年 1 月 12 日前往北京。H.A. 米哈伊洛夫任代表团团长，其他成员则包括苏联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B.C. 格拉先科、苏联文化部副部长 Г.А. 奥尔维德、苏联卫生部对外联系处处长 H.И. 马特维耶夫、电影制作总局副局长 A.Φ. 卡拉什尼科夫、出版总局副局长 A.И. 雷宾、苏联文化部对外关系管理局局长 B.A 波尼。

中方代表团由中国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文化部第一副部长钱俊瑞、文化部副部长张致祥、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刘恺风、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文化部部长助理王阑西和黄洛峰、艺术局副局长周巍峙组成。此外，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张映吾、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阳翰笙、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戈宝权也参与了工作。

委员会关于制定《1957 年苏中文化合作计划》的工作于今年 1 月 12—18 日进行，现场氛围非常友好。

需要强调的是，中方同志对待本次工作非常认真，他们有组织地、深入具体地开展了本次工作。

在第一次联席会议上，钱俊瑞同志进行了发言，简要总结了过去一年的文化交流成果，并指出苏中在文化各个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良好进展，中国对苏联的无私帮助予以高度评价，而且中国的文化工作者应该更加深入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钱俊瑞同志表示，相信两国在文化合作方面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苏方作出相应的回应。

在委员会工作期间，通过了苏方的提案，除了拟定 1957 年具体措施计划外，还就长期计划交换了意见。

双方于今年 1 月 18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签订了《1957 年苏中文化合作计划》。

根据双方关于混合委员会工作成果的协议，公布了由中方同志起草的公报（附后^①）。

计划签署后，刚从缅甸返回北京的中国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同志交给苏联代表团一封信，信中提到将赠送给苏联博物馆 550 件清代（17 至 19 世纪）瓷器、玉器、珐琅器、漆器和刺绣等艺术品。

苏联代表团于 1 月 18 日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中国和外国记者出席了此

^① 公报未出版；参见：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全宗4，目录16，案卷号203，第91～95页。

次招待会。

在记者招待会上，苏联代表团作了关于《1957年苏中文化合作计划》及其对巩固苏中人民友谊意义的声明（声明内容附后^①）。

有必要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报告，中方同志所做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刘少奇同志与代表团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交谈。我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进行了四个小时的交谈。在上海，我与市委领导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在文化部，我与中方相关人员就思想工作和文化合作具体问题总共进行了10多个小时的交流。

代表团抵达前夕，相关刊物和广播上报道了大量关于苏中文化合作的消息。《人民日报》以及《友好》先后刊登了《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和其它材料，包括中国文化部代理部长钱俊瑞的一篇长文。

所有这些政治工作的基本方向，从刘少奇同志在中共中央与代表团会谈时提出的论点中便可以看出：“苏联为全人类指明了道路。苏联人民的经验和文化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学习你们的经验。你们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无私帮助。”

《1957年苏中文化合作计划》提出，双方将进一步扩大两国间的文化交流。

《计划》提出，双方将互派大型艺术团体。苏方将派新西伯利亚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哈萨克国家人民乐团到中国演出。

中方将派中国歌舞团和杂技团在苏联（包括远东）开展巡回演出，他们将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大学生联欢节。

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互相举办美术展。

《计划》提出，在电影领域，双方将联合制作一部有关苏联和中国炼钢工人的故事片、几部彩色宽银幕风景片、一部关于阿拉木图—兰州铁路干线的科学教育片。将扩大电影领域的技术经验交流。苏联在北京、中国在莫斯科分别建立电影新闻采访站。

《计划》提出，在出版领域，双方将定期交换出版计划、建议出版的书籍清单，建立苏联加盟共和国出版社与中国少数民族出版社之间的联系。

双方还将在高等教育、教育和卫生保健领域开展比1956年计划范围更

^① 1957年1月18日苏联代表团在记者会上就签署1957年中苏文化合作计划发布的声明未出版；参见：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全宗4，目录16，案卷号203，第91页。

广的活动。除交换大学生、研究生，邀请教师外，双方还将建立苏联和中国院校、医疗机构之间的定期交流，定期交换科学著作、大纲、期刊、教学书籍、计划书、科研工作计划等。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正在飞速发展。

报纸的年发行量从1950年的7.98亿份增加到1956年的24.01亿份；书籍和手册的年发行量从1950年的5.95亿印张增加到1956年的43亿印张。

电影院的数量从1950年的641家增加到1956年的955家。

在1949—1950学年，中国的学生人数为2577.6万人。1956年，学生人数则增加到6627.5万人。

根据中国十二年发展规划，预计将电影制作量从1955年的112部增加到1967年的367部（包括136部故事片）；在8个城市建立新的电影制片厂；电影放映站数量计划从1955年的5876个增加到1967年的76000个；艺术团体数量将从1955年的2414个增加到1967年的2811个；报纸数量从1955年的289份增加到1967年的4500份；在北京建设15个印刷厂。

随着苏中文化交流不断发展，鉴于中国人民对苏联国家普遍表现出的强烈兴趣和真诚的尊重，我们绝不允许文化交流工作中存在严重的缺点，甚至是错误。苏联汉学家断言，苏联汉学新人的培养完全无法令人满意。

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已经有足够多懂汉语且在某种程度上了解中国文化的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如果说过去某位懂汉语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与其专业不相符，这并不是因为这类人才过剩，而是因为其只能算是表面上了解中国，实际上，他接受的培养并不足以胜任汉学家。

语文学博士奥沙宁同志认为，问题在于苏联的大学都是按照一种模式来培养汉学专家。奥沙宁同志表示，我们对未来汉学家的培养在内容和质量上与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国际问题专家、文学家、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几乎没有差别。

奥沙宁同志和谢尔久琴科教授认为，我们培养的所有汉学专家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经济都知之甚少。

奥沙宁、谢尔久琴科同志等工作人员认为，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不足便是苏联的汉学专家只在苏联的大学学习。实践证明，如果年轻专业人员从苏联大学毕业后能够去中国的大学学习2～3年的话，则会成就斐然。在个别情

况下，如果苏联青年在中国读完高中，也会取得积极成果。显然，各种培养方式相结合会取得好的结果。

很明显，为苏联培养汉学专家，我们必须利用最丰富的机会，包括在中国的大学培养苏联大学生和研究生，在中国为他们组织实践活动。目前，只有一名苏联研究生戈尔戈尼耶夫同志在中国学习，中国的同志们开玩笑地告诉我们，戈尔戈尼耶夫同志没有时间学习——他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充当苏联大学生的代表。

“毕竟，”他们说，“他一个人面对的是整个中国。”

在培养人才和中国青年学习俄语方面，中方同志需要苏联的大规模帮助。

在与我们的交谈中，中方同志希望明年派遣至少 700 名研究生到苏联的大学学习。仅在 1956—1957 学年，就有 1349 名中国大学生和 520 名研究生开始在苏联的大学学习。目前约有 300 名教师在进修。

我们的许多机构，尤其是科学院及其相关研究所，在研究中国问题方面存在重大不足。

不久前苏联创办了汉学研究所^①。但很遗憾，该研究所还没来得及开展工作。至今为止该研究所只有三个房间，甚至都没有办公场所。研究所没有配备工作人员。当然，就研究中国问题而言，科学机构实际上差不多是最重要的机关，然而，在这样的条件下，科学机构在中国学者眼中也未必具有足够的权威。

大量事实表明，我国许多科研机构在研究中国问题方面做得有多糟糕。

我们出版的一些科学作品没有深度，不够准确。

汉语教授奥沙宁引用了这样一个事实。苏联翻译了吕叔湘的汉语语法，虽然这本书是由我们国家最好的语言学家翻译的，但是语法内容中存在很多严重错误。

根据苏联学者的观点，在中国，奇科巴瓦的《语言学概论》完全没有得到认同。中国曾经非常期待这本教科书，但它辜负了人们的期望。我们的同志声称，该教科书不仅没有好好地阐述中国的语言学问题，也没有好好地描述印度的语言学问题。中国学者在奇科巴瓦的教科书《语言学概论》上做了标注，并寄到了莫斯科。然而，教科书的第二版没有进行任何修正，这让中国学者非常吃惊。

① 参见本汇编第78号档案。

中国向我们提供了最丰富的物质文化历史和人类社会历史宝库。然而，苏联学者在这一领域开展的工作非常薄弱。我们甚至说不出近几年来就这些问题出版了哪些重要著作。在这一领域我们的学者与中国学者的合作非常不理想。

苏联学者的一些作品迟迟不能面世。例如，《汉语语言学汇编》已经编写大约五年了。谢尔久琴科同志的著作《关于民族文字的创造》^①自 1952 年以来一直未出版，而中国在此期间已经出版了两版。

谢尔久琴科同志是科学院的研究员，自 1950 年以来他只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

我在中国遇到了苏联科学院的一组科研人员。其中有一位是研究员索恩采娃同志。早在 1953 年，针对汉语语法中的一个问题，她和佳普金娜同志一起完成了一部作品。

数月以来，科研人员试图发表该作品，但均徒劳，于是，他们删减了手稿，提交学术委员会批准，通过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办理手续并寄到中国。在索恩采娃到达北京后，她看到自己手稿的中文版本已在中国商店出售。

与苏联机构有工作关系的中国科学机构和研究所都是由中国最著名的学者和专家领导的，与之相比，苏联科学院很明显对待许多中国的实际问题浮于表面且不认真，这就更加不对了。

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表示，很多问题他们既没有得到外交部的回复，也没有得到科学研究所的回复。两年来，科学院一共就寄了一封信，信中还没有什么关于工作的实质性指导。

应该说，通过苏联文化部派至中国的苏联专家，也没有从我们这里得到足够的帮助，我们没有与他们保持经常联系。

苏联出版社在中国文学出版领域严重落后。

虽然我们预计在 1957 年出版中国作者的书籍达 100 部，这比之前出版的书籍多很多，但仍然非常少（1956 年中国出版了 6210 部苏联书籍）。苏联出版人仍然对中国文学知之甚少。文化部派遣了出版、印刷工业和图书发行总局副局长雷宾同志前往中国，与中国的同志一起研究继续在苏联出版更多中国文学作品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的音乐事业正在积极发展，开办了两所音乐学院，交响乐团

^① 即 Г. И. 谢尔久琴科的《中国文字及其改革》，1959 年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

定期举办音乐会，合唱艺术发展良好，中国的独奏人才也在不断增加；音乐创作不断发展。

近年来，作曲家马思聪、李焕之、贺绿汀等人创作了一些值得认真关注的作品，但是，苏联偶尔才会演奏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在苏联剧院的演出剧目中，中国戏剧暂时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苏联文化部正在采取措施弥补这些不足。

应该说，苏联的报纸和杂志仍然很少刊登有关中国人民生活和文化的信息。

三

我认为有必要汇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①在中国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工作方式陈旧，在当前条件下远远无法满足新的要求和需求。文化领域的交流得到了新的发展，在此情况下，出现了很多新问题，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工作水平仍止步不前。

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活动中，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代表团的访问上。但中方同志直接告诉我们说：显然，现在不太需要两国知识分子代表进行长时间、无实质内容的空谈，不太需要宣传众所周知的口号等。目前，我们应该讨论的是如何让这项工作更加深刻，更加有目的性。

此外，应该指出的是，有时候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团的访问准备得非常糟糕和匆忙，往往达不到预期的结果。

不久前，凯洛夫同志率领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团访问中国。该代表团由苏联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组成——文学家卡达耶夫、坚德里亚科夫、艾德林，艺术家韦列伊斯基，作家 H.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妻子 P. 奥斯特洛夫斯卡娅。

代表团临行前的最后一天，凯洛夫同志才被批准担任代表团团长。因而，

^①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苏联社会组织，成立于1925年4月5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任务是建立和发展机关、社会组织、个人之间的科学和文化交流；组织国际展览，组织苏联艺术团体参加外国联欢节和竞赛，组织外国与苏联友好和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以及著名科学家和文化活动家个人赴苏旅行。根据会章，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成员可以为科学和文化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协会成员共同组成一个部门，划分为两个组：科技组和艺术组。从1949年起，该部门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苏联文化处下运作。协会的领导机构是选举出的由主席领导的理事会。协会的办事机构由秘书处和一批内设机构组成，人员多次变化。部分内设机构具有职能性，指导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具体工作方向：书籍交换处、展览处、印刷处和接待外宾处等。另一部分处室以地区命名，从事组织同确定区域的国家进行科学和文化联络工作，例如美洲国家处、不列颠国家处、中欧国家处等。1957年9月5日，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决议撤销该协会，在该协会基础上成立了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联络协会联合会。

他无法为中国之行认真做好准备，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没为这次中国之行做好充分准备。

代表团成员参观了中国的几座城市，每座城市都待了2～3天。大部分时间花在参观各种项目，参加宴会、接待上等。代表团成员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工作。

回到苏联，这些代表团通常会立刻解散，没留下任何记录。

我们认为，对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工作进行根本变革早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目前复杂化的形势下，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失去了自己的权威，变成了一个与中国广大知识分子阶层没有深入联系的、纯粹的礼仪性代表组织。

我们注意到，很多苏联知识分子代表，尤其是文学家、记者、艺术家，在访问中国后并不怎么发表随笔、短篇小说、研究性著作。但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让我们注意到了以下情况。

苏联记者不仅发表关于访问美国的个人随笔，还出版了很多关于访问美国的书籍。朱可夫、克拉米诺夫、伊扎科夫同志等记者发表了很多关于美国的作品。

至于中国，记者发表的作品就比较少了。

四

在中国逗留期间，我与中方同志多次谈论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口号。

首先，中方同志认为有必要讲述在哪些具体情况下，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在什么政治背景下，他们需要提出上述口号。他们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下，当中国的人民政权得以巩固，当共产党的威信大大提高，当工农联盟得以巩固，当很大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站在真诚服务劳动人民的立场时，才提出了这一新口号。这是为了进一步团结知识分子，为其创作工作开辟新的广阔机会。其中一个主要条件是，这个口号在战略上有助于共产党确保中国广大知识分子阶层的进一步团结。

陆定一同志在一次交谈中特别强调了如下方面内容。

他说：“常言道：‘引蛇出洞。’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中的哪些人感染了唯心主义观点，感染了不正确的思想，从而耐心地为他们开展思想工作。”

“我们不想，”陆定一继续说，“我们的植物在温室条件下生长。我们

希望植物经过锻炼，变得强壮。它可以在斗争中得到锻炼。”

“我们不想与虚假的敌人作斗争，我们应该与真实的敌人作斗争。”

“我们应该向年轻人展示唯心主义观点的内容，例如唯心主义哲学。年轻人应该自觉学习为什么唯心主义哲学应该让步于唯物主义哲学，让步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陆定一同志与刘少奇同志一样强调，中国知识分子非常赞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口号。关于此，陆定一同志列举了这样一个事例。他曾经有机会与梅兰芳进行交谈。梅兰芳曾说，与旧封建艺术作斗争的旗帜下，他不被允许发表言论。尽管众所周知，他是中国资历最老、最著名的国粹大师之一。现在，在新的口号下，人们对梅兰芳表演艺术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中国文化部代理部长钱俊瑞同志说：《人民日报》上不时刊登一些论证有必要了解唯心主义哲学和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文章，通过这种方式展示这些理论的错误性，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先进作用。

特别是张岱年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议论文中写道：“在新中国的新社会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主流思想。为什么当时还赋予了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哲学的发展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互斗争的过程。唯心主义不仅具有阶级性，还具有认识论起源。唯心主义甚至可以在阶级消灭之后依然存在，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之间的斗争目前在社会主义社会哲学中仍将继续。

唯心主义的开放性交流讨论旨在促进哲学意识形态斗争的发展，活跃哲学思想，提高理论水平。赋予唯心主义宣传自由不仅不损害唯物主义，反而有助于唯物主义思想的繁荣。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和建设完成之后，哲学界学者之间的竞争不仅表现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竞争，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同一唯物主义阵营中各个学派的竞争。在最近几年存在一种普遍的趋势，表现为要求所有意识形态言论都符合某些标准，一个问题只允许一个可能的答案，一个理论只允许一种可能的解释。真理只有一个，但追求真理的过程往往是曲折和复杂的。因此，涌现坚持不同方法、不同观点的各个学派是一种合理现象。不同学派的形成是科学研究工作蓬勃发展和理论水平不断提高的有力保证。”

在中共中央进行座谈期间，刘少奇同志特别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口号只有在符合这一口号性质的特定条件下才可以提出。

刘少奇同志说：“我们了解到，越南很想提出这样一个口号。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越南的同志说，他们还没有提出这种口号所需要的环境，在越南的条件下，提出这种口号的时机还不成熟。”

刘少奇同志继续说：“我们曾经在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进行过关于这个口号的谈话。但我们认为，在匈牙利的环境下，不应该提出这个口号。事实表明，匈牙利实际上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

刘少奇同志最后总结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口号，是因为所需的条件已经成熟。”

在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交谈中，中方同志认为必须要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口号需要党的日常领导。

陆定一说：“提出这个口号后，党的领导作用越来越大，党的机关工作也越来越复杂。”

根据与中方同志的交谈，与创作型知识分子代表的会晤和中国刊物上的言论，我们认为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一些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相关的情况，特别是关于以下问题。

关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态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表明，除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外，其它艺术创作方法也可以应用于艺术。

目前，中国刊物强调这样一种观念，在艺术创作方法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是最具革命性的，是最完善的，因此，尽管可以采用各种艺术创作方法，但对共产主义作家而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应该是关键性的唯一方法。共产主义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必须从这种方法出发。

关于反对文学和艺术中的公式化。文学和艺术应该触及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一些旨在披露对人民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方面的作品有时会带有公式化色彩，艺术性不足。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下，出现了很多反对这类作品的尖锐批评性言论。为此，中国刊物上刊登了一些材料，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不应该以反对公式化为借口，对反映当今生活重要问题但有时带有一定公式化色彩的作品进行严厉批判。公式化作为一种缺点，应该被批判，但同时不应该抹去这些作品的政治意义。

关于对传承经典的态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传承经典的态度。如果说中华文化是历经多年而不失其价值的宝藏，那么这种改变尤为正确。与此同时，有时会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

号为幌子，不加批判地接受古老文化遗产中不太好的观点；或者，不加批判地改编一些古代文学和文化样本，严重违反艺术原则；有时只是为了使自己的名字像作者一样流芳百世。中方同志认为，应该纠正这种不足之处。

从与中方同志的交谈中可以得出结论，他们并不总是清楚为什么苏联没有发表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问题的文章和其它资料。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中方同志努力讲清楚为什么在中国的背景下必须提出这个口号。

陆定一同志在一次交谈中指出：

“我们不怕这个口号，我们认为也不应该害怕它，因为它只会帮助我们，会让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更好。”

五

为加强和进一步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合作，苏联文化部计划实施一系列活动。

在出版领域，文化部计划出版一系列中国哲学、历史、文化、经济著作，增加发行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计划出版中国诗歌选集，建立“新中国”文库，收录一系列有关中国地理、经济、文化的大众出版物。音乐出版社将于今年发行中国作曲家作品集，而国立造型艺术出版社将发行“中国人民艺术”画册。

在电影领域，文化部计划大力加强苏联和中国电影工作者的创造性合作。除了共同拍摄故事片、纪录片、风景片外，苏联电影制片厂、导演和编剧还将与中国电影制片厂和电影工作者建立长期联系，将每月发行有关中苏友谊的新闻影片。

此外，还计划为苏联学生拍摄有关中国的科普影片。

文化部正在采取措施，将中国剧作家的剧本作品搬到苏联剧院。今年，音乐团体和独唱家们将在自己的音乐会节目单中加入中国作者的作品。

1956年，中国文化部向苏联博物馆捐赠了2000多件中国艺术品。目前，中方同志还为我们的博物馆提供了另外的550件展品，文化部准备向中国回赠一定数量的苏联博物馆藏品。

有关扩大苏中文化合作的措施以及实施1957年合作计划措施的问题，将在文化部内部进行讨论。

我认为有必要向您汇报以下提案（附后^①）。

苏联文化部部长
H. 米哈伊洛夫
1957年1月30日

附注：“报苏共中央书记处。”^②

“第Ⅱ228号^③应返给苏共中央总务部一处。”

“分送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候选人和苏共中央书记。”^④

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全宗4，目录16，案卷号203，第71～87页，
核准文本，机打文本

俄罗斯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全宗2329，目录8，案卷号519，第1～22
页，副本，机打文本，绿墨水修改

5. 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关于1957年苏中文化合作计划的 完成情况和1958年两国之间文化合作计划的报告^⑤ （1958年1月20日）

近年来，在平等、友好和互助的基础上，苏联和中国亲如兄弟，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和显著发展。

1957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按照文化合作计划顺利开展。^⑥实施计划规定的活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有助于进一步巩固苏联

① 关于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苏中文化领域关系问题的提案未出版；参见：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全宗4，目录16，案卷号203，第88～90页。

② 该附注用墨水写成，后面的附注为机打。1957年2月14日苏共中央书记处成员轮流投票表决该问题（第32号会议纪要第222项）并提交苏共中央主席团审议。

③ 苏共中央主席团审议文件号。

④ 1957年2月1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在会议上（第Ⅱ76/XXVII号会议纪要）研究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苏中文化领域关系”的问题，决定“委托中央书记处审议和解决关于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苏中文化领域关系的问题”。参见：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全宗4，目录16，案卷号203，第70页。

⑤ 报告及中苏友好协会理事成员C.Л.齐赫文斯基的附函于1958年1月20日寄给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主席A.A. 安德烈耶夫。同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收到该报告，收文第1558号。参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P-9576，目录5，卷宗22，第233页。

⑥ 波浪线标出部分为档案原文中用红色铅笔着重标示内容，下同。下一段档案原文中页面左侧有阅读时用红色铅笔所做标记。

和中国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

1957年，苏联艺术团体新西伯利亚歌剧舞剧院、哈萨克库爾瑪加茲国家乐团，以及C.里赫特、Д.奥依斯特拉赫等个人表演者在中国的表演取得了巨大成功。新西伯利亚歌剧舞剧院在中国逗留了三个月。在此期间，新西伯利亚歌剧舞剧院在中国的大城市举行了85场戏剧演出和音乐会，近50万观众观看了表演。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出席了在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Д.奥依斯特拉赫音乐会。

中国人民对19世纪俄罗斯美术展以及苏联艺术家库克雷尼克斯、法沃尔斯基、托姆斯基、穆希娜、拉切夫的作品展很感兴趣。

在苏联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大学生联欢节期间，中国歌舞团受到了热烈欢迎。联欢节结束后，中国歌舞团继续在苏联远东地区进行巡回演出。在过去的一年里，在苏联举办了中国杂技表演和中国国画展。

1957年，苏联和中国许多文化、科学、教育及其他代表团进行了互访。仅通过苏联和中国文化部就大约有300名中国文化工作者访问了苏联，大约有200名苏联文化工作者访问了中国。

1957年，3名中国教授在苏联从事长期工作，220名苏联教授和教师在中国从事长期工作。

1957年，4795名中国学生和1094名中国研究生在苏联学习，51名苏联学生和4名苏联研究生在中国学习。

中苏友谊协会从1957年十月开始出版俄语版《友好》杂志，受到了苏联读者的极大欢迎。

1958年初，中国朋友能够阅读到苏中友好协会新出版的中文版苏联周刊《苏中友好》。

1958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合作计划覆盖了戏剧、音乐、造型艺术、电影、博物馆、图书馆、新闻和出版、广播、高等教育、教育和卫生保健领域的大范围合作活动。按照规定，两国体育运动委员会根据《苏中文化合作协定》（1956年7月5日）签署的《1958年体育活动年度计划》，将成为1958年文化合作计划的组成部分。

双方商定，大力鼓励相关机构和组织之间，以及文化、教育及卫生保健工作者之间扩大直接交流。

1958年文化合作计划包括许多颇具前景的活动。因此，在筹备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本计划规定共同制作纪录片“苏中兄弟合作十年”和一部大型故事片。苏联图书出版社将着手出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专著、科普读物和小册子。苏联广播从 1958 年下半年开始组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特别节目。

苏联国家模范大剧院、莫斯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 - 丹琴科音乐剧院、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新西伯利亚歌剧舞剧院、中国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国实验话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以及其它莫斯科、列宁格勒、北京和上海的剧院将参加苏联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苏联国家交响乐团和苏联国家模范俄语合唱团将与中国中央乐团保持友好交流。将进一步深化国立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与中国中央音乐学院，国立列宁格勒音乐学院与上海音乐学院，苏联国立模范大剧院舞蹈学校与北京舞蹈学校以及其它苏联和中国戏剧、艺术和电影学校之间的交流。

明年，中央实验歌剧院和中国杂技团计划在苏联进行巡回演出。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歌舞团和苏联国家交响乐团将访问中国。中国的朋友们将协助新西伯利亚歌剧舞剧院上演中国民族芭蕾舞剧“宝莲灯”。

1958 年，苏联和中国电影大师将共同完成大型彩色科学教育影片“阿拉木图—兰州”，该影片讲述了友谊之路阿拉木图—兰州铁路干线的建设；完成两部有关伏尔加河和长江的彩色宽银幕纪录片，这两部影片反映了人民政权期间两条伟大河流两岸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将完成一部关于中国动物世界的彩色科学教育片，并将开始联合制作一部以中国民间故事为主题的动画片。

1958 年，将在中国举办“苏联油画和雕塑 40 年”回顾展和苏联漫画家作品展。

执笔人：O. 瓦西科夫

[1958 年 1 月 20 日]^①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 P-9576，目录 5，案卷号 22，第 234～236 页，正本，机打文本

① 按苏中友好协会理事 C.И. 齐赫文斯基的附函标注日期。

6. 新华社总社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八周年纪念日报道致各分社的电报（1958年1月30日）

各分社：二月十四日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八周年纪念日，全国八大城市和旅大、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同苏联关系较密切的城市都有庆祝活动。请各分社注意报道当地的庆祝活动，将稿件在当晚发到总社。此外还可以选择一些苏联援助建设的工矿企业和农场及其他生动事例进行报道，以宣传苏联对我国建设事业的援助和中苏人民的友谊，这些稿件要在节日前一周内陆续送来，不求量多，内容要精彩，以免节日稿件过于集中，影响采用。

总社

一月三十日

中国中央档案馆，Z162-12-132-1

7.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关于1959年苏中文化合作计划的完成情况^①（1960年1月22日）

第428号

1959年，苏联和中国的文化合作进一步深入和加强。文化合作计划已基本完成。^②约580名苏联文化和艺术工作者访华，约550名中国代表访苏。

最有意义、最有成效的活动包括：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大型表演团体交流

①苏联国立模范大剧院芭蕾舞团和乐队在中国进行巡回演出（计划第2“甲”条）。由著名的苏联文化工作者Г. 乌兰诺娃、O. 列别申斯卡娅、M. 普利谢茨卡娅、Ю. 法耶尔组成的剧团受到了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他们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包括武汉钢铁公司、北京电子管厂等大型工业企业举行

① 使用档案原文标题。

② 指《1959年中苏文化合作计划》。参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P-9576，目录5，案卷号80，第118～123页；俄罗斯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全宗2329，目录8，案卷号1168，第1～6页及案卷号1170，第75～81页。

了 39 场演出和音乐会。大约 20 万人观看了演出。

中国朋友就国立模范大剧院芭蕾舞团的巡回演出拍摄了专门的大型彩色纪录片，毫无疑问，该影片在中国的上映将有助于宣传苏联文化成就。

中国报界认为，苏联芭蕾舞大师的表演及其与中国演员这种艺术创造者之间的会晤，为国家的文化生活，尤其是芭蕾舞艺术的发展留下了明显的印记。

②中国青年艺术歌舞团和广东民乐团在苏联进行巡回演出（第 1 “甲”条和第 2 “乙”条）。青年艺术歌舞团在莫斯科、基什尼奥夫、敖德萨、第比利斯等城市的表演大获成功，约有 5.5 万人观看了他们的演出。与苏联戏剧和音乐界多次举行友好会晤。根据中国朋友的要求，青年艺术歌舞团的巡回演出从一个月延长至两个月。

2.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前共同完成了一部彩色故事片“风从东风来”的摄制工作。该片有两个版本：宽银幕和普通银幕（第 4 条）并举行了盛大的首映式（第 7 条），首映式在莫斯科的电影之家举行。这部影片在全苏联放映，根据苏联报界的大量评论，这部影片受到了苏联观众的热烈欢迎。

3. 在苏联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中国故事片、纪录片和科学片电影节（第 5 条）和在中国举行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二周年的苏联电影节（第 6 条）。中国电影节在苏联的 22 个城市举行，影片《党的女儿》、《鸦片战争》等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成功。

4. 中方向苏联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摄影展展品（第 10 条）。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期间，展品在苏联国家革命博物馆展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 14.6 万人来参观。在莫斯科展出后，展品将被送往列宁格勒、明斯克和基辅展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5. 向中国提供苏联各民族实用艺术和民间工艺美术品展览的展品（第 11 条）。展品在上海和北京展出。根据苏维埃政府的决定，展品作为礼物送给中国。

6. 苏联人民演员 T. 库济克和国际比赛获奖者 A. 索连科娃在中国进行巡回演出（第 2 “乙”条）。在过去的几年，苏联演员还在新兴的工业中心武汉、西安和成都进行了演出。除了音乐会活动外，苏联演员还举行了一系列讲座，向中国专家展示他们的技艺。

以下是其它计划项目的执行情况。

文化和艺术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张映吾和舞剧导演李仲林出席了在新西伯利亚歌剧舞剧院上演的中国民族舞剧《宝莲灯》首映式（第3条）。

双方继续交换新闻影片、幻灯片、底片等资料（第8条和第9条）。

一名专家到中国学习出版彩色造型艺术作品的方法（第12条）。

广 播

苏联和中国广播机构继续交流各种音乐录音带和广播节目（第13条和第18条），在国庆节时专门播放关于苏联和中国的广播节目（第14条），相互交流电视新闻片专辑、音乐会节目和电视影片（第15条）、交流有关使用文章、音乐录音和其它资料的信息（第16条），定期通过苏联和中国广播用俄语和汉语转播半小时的苏联生活和中国生活节目（第17条）。为了照顾中国听众，苏联广播节目在中国的转播时间从晚上改到了白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苏联派出一名电视记者和一名电台记者前往中国进行短期出差，通过广播电视节目为苏联的电视观众和广播听众报道中国的生活（第19条）。

高 等 教 育

双方邀请了在苏联和中国工作的专家进行讲课，开展咨询。根据中方的要求，向中国派遣了2名苏联专家进行讲课（第22条）。

5名中国教师参加了社会主义国家高校俄语教师进修班（第23条）。

1959—1960学年，3227名中国大学生和1416名研究生和教师在苏联的大学学习（第24条）。

从国立莫斯科大学和国立列宁格勒大学派遣了12名苏联语言学专业大学生到中国学习（第25条）。根据相互协议派遣工程专业的大学生这一条没有得到执行。

……^①

体 育

根据1959年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体育活动时间计划，举行了15^②个体育项目的比赛：滑雪、滑冰、冰球、登山、足球、篮球、排球、田径和举重、乒乓球、

① 下文省略章节“卫生”，内容有关中苏在该领域的合作。参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P-9518，目录1，案卷号111，第225页。

② 档案原文如此。

自由式摔跤、体操、游泳和水球。1959年，14个中国体育代表团共204人来苏访问，15个苏联代表团共211人赴华访问。第二届苏联人民运动会的荣誉嘉宾是中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席荣高棠，第一届中华全国运动会的荣誉嘉宾是苏联体育协会和组织联合会主席团主席罗曼诺夫。

应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关于协助中国为中国中央革命博物馆收集历史资料和展品的请求，国家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通过各个部门收集并无偿赠予中方778件展品^①，包括罕见档案的原件和影印件，这些展品反映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中国人民参与十月革命和苏联卫国战争，苏联人民在中国革命、抗日战争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对中国提供了兄弟般的帮助。

苏联新闻局、《苏中友好》杂志、外国电台以及苏联刊物、电视、新闻片和广播，依旧系统地报道了文化合作计划所规定的活动。

过去的一年里，苏联和中国文化交流委员会之间系统地交换了意见，也交换了苏联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信息。

虽然存在个别不足，如推迟进行某些活动，推迟发送某些宣传材料等，但是总体上，与前几年相比，1959年文化合作计划在较高组织层面完成了工作。

1959年计划所规定的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举办的活动，有助于进一步加强苏中文化合作，促进苏中兄弟般的友谊的思想在苏联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播。

瓦西科夫

[1960年1月22日]^②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P-9518，目录1，案卷号111，第222～226页，正本，机打文本

^① 参见本汇编157号档案和档案脚注。

^② 按O.B. 瓦西科夫签署文件日期标注。报告及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席Г.А. 茹科夫的附函于1960年1月24日寄给中国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张奚若。参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P-9518，目录1，案卷号111，第221页。

8. 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0年2月26日）

文总 133 号

秘密

时 间 1960年2月26日下午3时

地 点 中南海武成殿

列席人 我方：外交部苏欧司陈伯清副司长

苏方：苏达利柯夫参赞，卡布拉洛夫一等秘书

译 员 王荇卿

记 录 李冠儒

契尔沃年科大使：我想，你的工作大概够忙的了。

陆副总理：不要紧，我非常欢迎你。

契：以前曾约见你几次，但你出去了，而我在此期间也回莫斯科两次，所以总未得机会同你见面。

陆：见面是见了的。

契：是啊，见是见了，但未正式谈过话。在一定程度上，我已可以被认作是中国公民和北京市的居民了，今后，我会更多地同你会面。

陆：很高兴听到你的话。我们知道大使同志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很有研究的人。

契：谢谢。谈到对于马列主义理论有研究，这对我是个夸大。生活使我更多接近实际。对于研究理论，总是希望放在将来和将来，拖来拖去，到后来又没有时间搞。

陆：实际也是理论指导的实际嘛！

契：是的，是这样。

陆：同时，理论也是来自实际。

契：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也更有活力。

陆：理论可能落后实际，也可能跑到实际的前面。

契：如果是跑到实际前面的理论，就一定是同实际结合得很好的理论，为实践指明道路，否则就没有价值。

陆：新的理论一出来的时候，常常很少有人赞成。比如在中国，马列主

义出现的时候，很少有人赞成，而反对它的人倒不少。马列主义到中国的时候已是很晚了，是在十月革命以后，但是，它已是很壮大的了。

契：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列主义。

陆：对。没有十月革命，马列主义到中国就会比较困难一些。

契：困难是无疑的，但肯定是会到的，虽然可能晚些。

陆：对。那个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封建的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列主义。只有李大钊、毛泽东、董必武和陈独秀等很少人赞成马列主义。陈独秀后来还成了叛徒。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仅有 12 位代表。

契：那是在 1925 年还是 1921 年？

陆：1921 年。

契：是啊！1925 年时已经有很大的革命斗争了。

陆：现在可以看出，这个理论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从中国历史来看，从鸦片战争到 1921 年总共 81 年期间，斗争没有什么成绩。而这还不算鸦片战争以前无数的农民起义战争。死了不知有多少人，但是没有什么结果。主要是理论不对，没有正确的革命理论。而在建立共产党以后，仅仅 28 年，成绩就大极了。

契：这很对。革命理论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够深入人心。

陆：因为这种理论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契：这就是马列主义理论的力量所在。正确的革命的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越来越有力量；而有些理论随着时间的进展却会变得烟消云散。

陆：但是，中国孔夫子的理论虽然不好，却延续了两千多年。

契：然而，这种理论却不能抓住人心。

陆：孔夫子的理论很厉害！中国的资产阶级没能打倒它，只有无产阶级、马列主义者才打倒了它。

契：你说得很对。革命的理论要由党把它传达给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接受它。因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产生了这样强大的战斗的党，它使革命的理论深入了人心。在 28 年里，也就是从 1921 年到 1949 年，党取得了胜利。在这 28 年以后的 10 年中，马列主义理论就不仅是一种革命理论，而且变成了人民的思想^①，这样，就使得你们能够在短短的 10 年内做到了上百年才能做到的事情。这就是说，理论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

^① 档案此处和后文用深蓝墨水标出。

陆：这是向你们学习的。

契：学是学过。现在我们是互相学习。

陆：你太客气了。

契：这不是客气。中国共产党是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中国的党创造性地运用着马列主义，理论结合实际，并且根据实际和理论制定政策。这也就是开始时我们谈到的实践丰富了理论。当然，苏联在这一长时间内用自己的发展和实践对马列主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丰富了马列主义理论，使这一理论提高了一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是用解决政治、经济问题和所遇到的其他问题的实践对马列主义的理论做出了贡献，所以，可以大胆地和毫不客气地说：这两个伟大的党对马列主义理论的丰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当然，其他兄弟党也做出了贡献。但是，它们所遇到的问题不是那么多，贡献也就可能小些。中国共产党有 1400 万党员，有强大的共青团组织，大量的知识分子，他们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大步向前，这一定要影响到其它国家，影响到亚、非、拉丁美洲人民的解放运动。所以，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中国的党每天都在以自己的实践为马列主义理论的丰富做出贡献。陆定一同志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取得了许多胜利，这一切胜利都是在马列主义旗帜下取得的。因此，这便要求我们的党在人民群众中做更多的工作，更多和更广泛地宣传马列主义，因为马列主义的理论可以使人民发挥更大的创造性，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作好工作。共产主义觉悟越高，爱国主义越强，胜利信心也就越大。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研究目前还存在着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不仅要研究和揭露它们的侵略阴谋，而且还要同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斗争，反对修正主义，保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这是我们神圣的义务。不久前，苏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党的宣传任务的决议，在人们中间广泛地进行政治思想和宣传工作，为我们今后国内的胜利和对外斗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我们知道，中国的党在思想工作、政治教育和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大力广泛地宣传马列主义，出版了很多马列主义的著作，列宁全集也已译成中文出版。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说过，要多出版一些马列主义理论书籍。我们对于这一点感到很高兴。苏联也出版了一些中国党的文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中国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著作。从这些著作中，苏联的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党对于马列主义的发展，总结性地阐述了中国党的革命实践。这正如你开头所说：实践丰富了理论。在苏联，人们

除研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外，对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和文件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些都是集体的创作，是从实际中丰富的理论，人们会从学习这些文件中学会如何看待过去和怎样展望未来。这是很有益的。

很对不起，占用了你很多时间。如我所知，你是长时期从事思想工作的。这是党的工作中很重要的方面。因此，如果陆定一同志得便的话，不一定是现在，而另外找一个时间向我介绍一下思想工作方面的情况，诸如中国党对思想工作的作法、对国内宣传和对外宣传的内容、党内教育情况。我也可以讲一些苏联的情况，不过，我想，这些你都很清楚。此外，我还想了解一下中国同志对苏联最近一个时期所出版的政治理论书籍的反映。最近，苏联出版的政治理论书籍有：康士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第三版（陆副总理：我们还未见到新版的。大使：我这次从莫斯科回来时看到了这本书的纸型，这本书已经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波诺马辽夫主编的“苏共党史”（陆副总理：我们已经译完出版了。苏联大使：我们已不学以前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了，因为生活起了变化。）、库西宁主编的“马列主义基础”（陆副总理：我们正在译这本书）。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了解一下你们在培养宣传工作者方面的情况。我们在培养宣传工作者方面有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校。地方党校的准确数字我记不清了，但大约每5～6个州有一个党校。这些党校都是多年制的。这些党校不仅培养党务工作干部，而且还培养苏维埃组织的干部。至于一般的训练班，那就更多了。

我愿意再说一次，我所要了解的东西不是很急迫的问题（陆副总理：大使也很忙嘛！），可以过些日子再谈，也可以简单地谈谈，今天谈也可，以后约时间谈也成。

陆：今年，准备在北京召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家会议。看来，这个会议一定会讨论到“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个会议是在各社会主义国家轮流召开。中国今年是这个会议的东道主。会议约在今年10—11月在北京召开。

契：是啊，以前曾在德国开过。这样的会议很有意思，也很有益。

陆：看来，有很多问题要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如思想教育和物质刺激的关系问题。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看来，各国兄弟党的经济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都很感兴趣。

契：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和物质刺激两者的关系问题。

陆：最近，我读了伊里切夫同志的一篇文章的摘要，其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契：就是人民日报摘要登载的“共产党人”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谈到了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陆：好，这些问题我们以后再谈好了！

契：很感谢你。我们何时再谈的主动权完全在你这一边了！

陆：谈不到争取主动权问题。你有时间时我们就可以谈谈。

契：我对我在前边所提的问题很感兴趣，很想同你交换一下意见。

陆：今天我在人民日报上看了涅斯米扬诺夫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了苏联的科学成就和今年的发展方向。这是一篇摘要。我在1928年底到苏联去过一次。那时，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看不起苏联。但是，现在苏联却远远地把它抛在后面。那时，德聂伯尔建设公司（按：陆副总理是用俄文说的“Днепрострой”）还聘有美国的工程师。

契：是啊，但这一切都过去了。

陆：现在苏联已经远远地把它抛在后面了。我们看到这些感到非常高兴。

契：这是我们大家的共同成就。是我们苏联、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胜利。

陆：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胜利。我们一方面派人到苏联去学习，另一方面苏联派人来教我们。在文教方面工作的苏联专家工作做得都很好，我们很感谢他们。以后关系会越来越密切。主要是苏联帮助我们，我们还很落后。

契：我们的专家离华时，都更丰富了自己的经验。（陆副总理：我们的接待工作做的还不好。）苏达利柯夫同志是搞这方面工作的。我们都常常告诉苏联专家，要他们仔细地研究中国在工业、农业和其他方面所取得的经验。我们的经验越丰富，我们的力量就越大，敌人就越削弱。

陆：是的。当然是这样。

契：恐怕你已经听说，苏联准备成立一个“友谊大学”。

陆：我还没有听说。

契：这是本月5号通过的決定。建立一所各国人民友谊大学。接纳亚、

非、拉丁美洲各国政府派来的学生，也接受那些在其本国无力升学而提出个人请求到该大学学习的人。初期准备招收 500 人，逐渐扩大到 4000 人。学生要在预科学习 3 年，在这个期间学习俄文和其它普通课程；本科学习时间为 4～5 年。另外，还准备从派学生来的国家聘请有关教师来该校讲课。学生的费用，包括来苏和返国旅费、学习和生活费用在内，全部由苏联负担。这笔费用的来源是最近裁减武装力量 120 万人所节约的款项和 1959 年超额产值 500 亿卢布中的一部分。这种办法很好。这些学生在苏联学过 7～8 年之后，思想也会变的。我个人认为，这个学校如果在苏联办得成功的话，在中国和德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当其教育工作发展起来，干部培养多了之后，也可以考虑成立这样的学校，培养外国学生。这所“友谊大学”不同于以前的纯政治性的共产主义大学，而是综合性的，包括各科，为各国培养工、农、文、教、卫等方面的干部。被接纳入学的人应是 35 岁以下。这样年龄的人政治上也比较成熟了。除国家选派外，想入学的人可以直接向驻在当地的苏联使、领馆申请。当然，资本主义国家会对这件事进行污蔑，反对这件好事。但是，好事总是会获胜的（按：据苏联真理报 2 月 24 日载称：“各国人民友谊大学”是由苏联亚非团结委员会、苏联对外友好与文化联系协会联合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办的；学校的领导——校委会是由上述三机构、苏联青年组织委员会和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派人组成。学校将由亚、非、拉丁美洲聘请著名学者任教。除医科为 5 年外，其余各科学学习期限均为 4 年。不能直接入本科者，需先入预科学习 1～3 年。愿入学者可向本国社会组织和政府机关，苏联驻该国使、领馆或直接向学校提出申请。）

陆：管理外国留学生是件很复杂的工作，陈伯清同志很清楚这一点。我们这里有 1000 多外国留学生，其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占少数，大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资本主义国家派的学生虽然少，但是他们十分复杂，例如阿联的学生根本不是来学习的，而是来搞特务的。

契：这是不可避免的。既然有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这种事情总是难免。看来，在这个即将成立的“友谊大学”里也难免有这种事情。

我们看到了国务院关于成立业余教育委员会的消息。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从理论上来讲，这是党把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同工农群众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加以结合。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革命，会产生难以估计的效果。这种作法有

着广阔的前途。

陆：我们这里各地都在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这就要求掌握知识和技术，要求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契：这是很有前途的一件事情。现在，很难预计到它会产生多大的结果。这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国民经济的发展要起最大的作用。

陆：我可以告诉大使一个消息。现在，业余教育正要反转过来革全日制教育的命。全日制学校的师生都要参加生产，搞教学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他们在现场进行教学。这样就发现教科书有些脱离实际。一教，工人就说了：你所讲的这种方法早就不用了。实际上，工人们在现场所用的方法要比教科书上讲的好得多，工农学习起来也很快（大使：当然，因为他们接触实际嘛！）。业余教育这样就要反过来促进全日制教育的革命。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全日制的教育要拖那么多年？要上那么多课？为什么不能快一些？我们现在的中小学教育需要12年。而学生的水平才能达到你们苏联十年制的水平。这是不是说我们中国人笨呢？

苏达利柯夫：你们的文字复杂。

陆：我并不这样想。

契：苏达利柯夫同志说的不是肯定的话，而是说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苏：苏联学生只需要知道30几个字母就行了，但中国学生要知道3000字。

陆：语文是这样。那么，数学、物理、化学呢？我们经过分析之后，发现，这是因为旧社会的时候没饭吃，而人们要吃饭，并且，为了个人的利益还想多吃一些，所以，教育工作者就要把教育时间拉长。教科书中有很多重复，有的甚至重复七次之多。（大使：这大概就是按“重复为成功之母”的原则搞的吧！）算术中有加法、减法、乘法、除法。单就一个加法来说，就想出了两个规律，有什么交换率，有什么综合率。而在讲 $4+3=7$ 时，还要讲3加4也等于7；讲 $3+2+1=6$ 时，还要讲这和 $2+1+3=6$ 、 $1+2+3=6$ 以及 $2+3+1=6$ 是一样的……等等。并且，这些东西还要学生会背。想出了很多难题，诸如“鸡兔同笼”等等。（大使：这都是些让人伤脑筋的题目！）现在，社会变了，有饭吃了，可以不必再为吃饭问题担心。但是，他们的思想还未变过来。（大使：是啊，思想没变过来！）。应当回过头来看一看，要为孩子们多设想一些，为社会多设想一些，不要单为个人着想，是不是可以把教育搞得快

点、好点、水平高一些呢？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一定会遇到阻碍。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一定要反对这一点，因此，一定还要革命。

契：这种现象过去在我们那里也有过。我们也是根据新经验和实践部分地修改教学大纲。比如十年制教育是对小孩子们讲的，但对业余教育和成年人来说，就要简化，因为成年人的理解能力强，不需要搞那些伤脑筋的题目，（陆副总理：对小孩子也是这样）。是的，因为教学大纲如果很复杂就会使学生负担过重。我同你们的教育部长谈过，在高等学校中学原子物理科学的那就要复杂一些，所以，要求自然也就不同。但是，一般说来，教育革命是需要的。

陆：在我们的教育界，还是18世纪、19世纪的教育学占统治地位。这种教育学很牢固，不把它批判掉没有用，所以，必须把它批判掉。

契：还要保留它的合理、有益部分，像在文学、艺术上一样，把起阻碍作用的东西除掉。

陆：那当然。18世纪和19世纪的已经比孔夫子的进步了嘛！

契：是不是比孔夫子的进步了，这点我不清楚。但是，一般来说，像俄国的教育家乌申斯基、别达戈夫和其他人的教育学就整个说来是不好的，我们也进行了改革，但把其中好的东西保留了下来，让它也来为革命服服务。

陆：这是没问题的。合理的东西还是要保留的。比如，给小孩子讲课时需要重复，但是不是要重复七次呢？！

契：这是个很具体的问题了！

陆：虽然这是一个具体问题，但却是一个思想问题，理论问题。不把它批判掉就不好办。我们刚刚是谈了教育。在我们的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方面也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源也仍然是18世纪、19世纪时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历史和哲学的理论。因为那时资产阶级的文化达到了最高峰。直到今天还有人崇拜它，不是批判它。现在我们就把它搬倒。我们是要走向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社会时，人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必须有极大的提高。中国的人口有六亿多，因此，这就不是几万人、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甚至几千万人的共产主义觉悟的极大提高，而是六万万多人的共产主义觉悟的极大提高。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要进行很大的工作，进行一场很大的斗争。不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大的斗争，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

契：是啊。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从人们的思想中消灭掉才能到达共产主义。

陆：要消灭掉，要彻底消灭掉。当然，一下子不行，要好多次，要反复地进行斗争，斗争、团结，斗争、团结，从而达到螺旋式的上升。

契：资产阶级思想是一种旧的残余的东西，它很顽固。而且今天还有资本主义世界。它正在利用无线电、报纸，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力图使那些已经倒台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能得到某些养分，这就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了。

陆：现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矛盾；将来，到共产主义社会时也还会有矛盾。不可能设想，那时就没有矛盾了。

契：当然。不过，那时的矛盾和今天的阶级矛盾不同，不是对抗性的。

陆：不，也可能有对抗性的矛盾。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矛盾可能互相转化。

契：共产主义时，会有矛盾，但这是新旧之间，进步和落后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社会就不能前进，矛盾是前进的动力。但是，共产主义社会时，既然已经没有阶级的社会基础，社会上已经不存在有敌对的集团，那怎么还能有对抗性的矛盾呢？

陆：历史表明，阶级内部矛盾搞得好就不是对抗性的，搞不好就会成为对抗性的。比如过去中国的皇帝，他们和皇亲国戚都是来自一个阶级，应该是没有对抗性的矛盾，但往往皇帝把皇亲国戚杀光。（大使：这是另一个问题。）当然，反对他们的有农民起义，但是有时他们自己也反对自己，互相残杀。帝国主义内部也有帝国主义战争。我们的阵营内部也出现过叛徒纳吉和叛徒铁托，苏联出现过托洛茨基。中国出现过陈独秀。矛盾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搞得不好，非对抗性的矛盾也可能变成对抗性的。不要否认这种可能性。在我国，我们没收了资产阶级的 80% 的财产，这就是买办阶级部分，另外的 20%，即民族资产阶级部分。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办法和政策，这种矛盾就转化成了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搞得不好，完全可能再变为对抗性的。当然，我这里所讲的是指民族资产阶级的大部分，有一小部分和我们也有对抗性的矛盾，比如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

契：你说的都对。但是你所举出的例子都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时的事，都是旧社会和现在的事情。因为旧社会和现在都有阶级斗争的社会根源和土壤。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们和铁托的斗争也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目前，一个党员也会有资产阶级思想。至于谈到共产主义社会，那时，不会有阶级

斗争的社会基础，连很小的阶级斗争也不会有。我们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时，会有克服矛盾的条件，从而使矛盾不致于由非对抗性的变为对抗性的。我个人认为，那时不会有生死的斗争。你们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没有成为对抗性的矛盾，是因为党、政权和其它社会力量阻止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反抗，堵塞了它们进行对抗性斗争的道路。我很同意你所讲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抗性的矛盾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当然，谈谈这些矛盾问题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是跑不掉的，我们不能离开生活，而生活中存在着这些问题。

陆：辩证法说，矛盾的两面是可以转化的。

契：我刚才已经说过，你所举的例子说明了矛盾是可以转化的，在有党和一定的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把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在这方面，中国的党有着重要的历史性的经验。这对其它各国共产党也有意义。这是极高的宝贵经验。

陆：但我们也天天准备着这种矛盾变为对抗性的矛盾。

契：对，是要随时准备回击它。要进行这种试验，党就必须有巨大的力量和信心。

陆：但是，也常有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比如，1957年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我们的猖狂进攻，使矛盾成为了对抗性的。这是突然出现的。我们把它打了下去，而且还要把他们中的大部分改造过来。当然，总会有那么一小部分人，至死也不会变。

契：这是斗争规律。

陆：我们最近登了马寅初写的文章。他在1957年还不是右派分子。他的理论一个是“人口论”，另一个是“团团转”，我们把它登了出来，这样好。

契：这说明党有信心，有力量。这些人不论怎么样，也不会得到真正的支持，因为他们的理论不对。个别人可能会跟他们跑，但是他们不会成为胜利者。当然，我们不会让这种思想放任自流。只要事涉我们的阶级利益，就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至死也要坚持。

陆：是要批判这种理论。马寅初的文章或许会得诺贝尔奖金呢！

契：我们苏联有帕斯捷尔纳克这么个人（陆副总理：对，就是写“日瓦戈医生”的那个人）。我在法国的书店橱窗中看到摆着这本书，出广告宣传它。也要给他诺贝尔奖金。我们也和你们一样，告诉他，如果他愿意领奖金，

可以领；如果他不喜欢我们的生活，也可以出国。但是，他拒绝领这个奖金，也放弃了出国的念头，表示愿意为人民做些好事。我们不敢确信他是否能做出什么好事，然而，这说明了社会制度、党和思想的力量。我们对他的改造还是有信心的。

陆：这也是把对抗性矛盾变成非对抗性矛盾的一个例子。然而，也有可能再转化回来。

契：刚才我们所讲的都对，但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在目前阶段，在有阶级斗争的情况下，我同意你的意见。而当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之后，情况就会是另一样了。

陆：那好，我们就谈到这里吧！辩证法讲，矛盾是会互相转化的。共产主义社会时，阶级消灭了。但在初期，还会存在一些问题。举例来说，象民族问题就会存在一个时期。逐渐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但还会出现别的问题。

契：我们谈到对抗性矛盾，首先是因为有这个矛盾的阶级基础。首要问题是看生产力掌握在谁的手里。共产主义社会时，所有制问题不存在了，民族问题就不会是在对抗性的基础上解决。象中国和苏联，现在已经把民族问题解决得很好。中国革命胜利后才只有十年，这在历史上只不过是一个极为短促的时间，但民族问题解决得却很好，可以说是等于一个时代。当然，问题总会发生的，克服了，又会发生，但不会是在对抗性矛盾的基础上解决。

陆：民族问题不过是例子而已。在共产主义社会时，生产关系还要改变。虽然都是全民所有制，但生产力总要发展，生产关系也要跟着改变。这样，在一个时期内，关系也可能是紧张的（大使：可能很尖锐，但不会是对抗性的）。我们这个世界存在到今天总有 50 万年到 100 万年了吧，而阶级社会才只有 3 千～5 千年。将来，这个世界还要存在 100 万年、50 万年吧（大使：是永恒的）。不能设想，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生产关系不会发生变化。变化总是要发生的。而且，也会有斗争。到那时，可能没有武器，但是，辩论辩论也可能动起拳来。

契：不久前土耳其的议会里还不是打起来啦，而且还叫来了救护车。

地球上全部变成共产主义社会以后，还有其它的星体，我们可以在共产主义的基础上，把它们变成和我们一样的社会。月球不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了吗？！

陆：这也是个理论问题。

契：是啊。

我感谢你今天接见了。耽误了你的很多时间（陆副总理：是我耽误了你的很多时间）。这次谈话很有意思。我愿保留在你认为得便的时间同我再见面一次谈些问题的权利。

陆：谢谢大使同志。

我们对苏联的党、人民、政府给予我们的帮助十分感谢。特别是在文教、科学方面，苏联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中国需要大量地培养文教、科学方面的干部和理论干部。我们还是学生。我们希望先生能在今后继续和更多地帮助我们。

尤金同志回去了，不晓得他最近身体怎么样？尤金同志第一次到中国来时，我陪他周游了全国各地。得便时，请你代我向 he 问好。

契：尤金同志现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医院里休养。现在，他的健康情况比以前好多了，是一个姓宋（译音）的中医大夫帮了忙。本来，预计是要切除一只眼睛的，但中医大夫帮助保下了这只眼睛。这次，我从莫斯科回来时，带来一份他的病历，想请宋大夫看看，提提建议。过几天我还要和他通一次电话。

尤金同志同我谈话时，他一再提到过你。谈到你们的相处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让我在见到你时，向你转达他的最热烈的问候。

陆：谢谢他。希望尤金同志很快恢复健康。

契：他今后大概要在科学院工作。

陆：是啊，他是院士嘛！

契：这次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时，在北京，以及中国的其它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我代表苏共中央、苏联政府对此向中国的党和政府，向北京的各机关和北京市委表示衷心的感谢。

陆：我们完全应该这样来庆祝。

契：祝你健康，也祝你在这个复杂而又极其重要的党的思想工作岗位上取得巨大的成就。

陆：谢谢你。

契：很对不起，耽误了你的这么多的宝贵时间。我还以为现在才不过是四点半钟，那（哪）知已经六点了。这都要归罪于那些“矛盾”。（大家大笑）

抄送：（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
（邓）小平、彭真、贺龙、（陆）定一、（陈）伯达、康生、
（王）稼祥、（谭）震林、（杨）尚昆、（胡）乔木、（罗）瑞卿、
外办（8）、中宣、中联（5）、陈、章、罗、姬、曾、耿、孟、
乔、办公厅（3）、苏欧司（2）、新闻司

中国中央档案馆，Z123-12-255-2，第1～18页